

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

石少颖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乌孙为西域大国,在汉、匈关系中一度举足轻重,西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首先因乌孙而提出,进而拓展为对于整个西域的宏伟设想。西汉采取了联姻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外交策略,促使乌孙的立场由“观望”转为“归汉”,这是西汉外交在“大宛之役”后的重大突破,亦对古代中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西汉;西域;乌孙;外交政策;华夷观

[中图分类号] K2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06)03-0340-05

西汉与匈奴是公元前后长城内外并存的两大政权。西汉自立国伊始,便一直受到北方宿敌匈奴的威胁。为了树立在对外关系中的权威,西汉统治者积极地拓展外交领域,将广阔的西域纳入视野之中。乌孙是西域大国,一度举足轻重,乌孙的向背将直接关系到汉、匈力量的对比。

一、乌孙其国及张骞“凿空”

乌孙其名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亦列有专条。乌孙本为游牧民族,“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卷61)占有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广大地区^[1]。在西域诸国之中,乌孙“最为强国”,人口众多,兵力首屈一指。正是基于对乌孙实力和影响力的考虑,西汉与匈奴都试图把乌孙拉拢到自己的一方。

汉初,葱岭以西的大国皆事匈奴,更不必说地近匈奴的乌孙。“匈奴使持单于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史记》卷123)匈奴为扩展势力,还以强兵进攻月氏,结果却导致乌孙难兜靡间接被杀^[2] 134。难兜靡之子及壮,重建国家。在老上单于支持下,乌孙重新占领月氏故地(今伊犁河、楚河流域),迫使大月氏人西迁,造成了中亚以及欧洲民族连环式大迁移,对世界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时,天下殷富,在外交上也开始变原来退让、迁就的政策为主动进取^[3] 40-50。然而,西域诸国与匈奴故有关系的存在,成了西汉通使西域的巨大障碍。乌孙作为西域门户,自然为西汉所关注。联合乌孙成功,“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卷61)建元三年(前138),张骞首次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未果;但“他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4] 439。他了解到,匈奴在西域的控制并不稳固;而乌孙难兜靡之死,匈奴难逃其咎。这使西汉看到了结交乌孙、打通西域的希望。

对西域的争夺也是对商路的争夺。谁能够主宰商路,谁就有可能主宰外交。因此,张骞积极建议,“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以期“兵可无战以渐臣”。(《史记》卷99)随着西汉国内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乌孙等商路国家的贸易地位越来越为汉廷朝野关注^[5] 99。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二度出使西域,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联合乌孙,共击匈奴。西汉派出了规模宏大的使团,“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汉书》卷61),同时捎带与小国的交往,以期扬威西域。但是,张骞作为大汉使节,在乌孙只受到与匈奴王同等的待遇,甚至远未达到像对匈奴那样的敬畏。张骞向乌孙表示,若“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乌孙人对此亦不热心。究其原因,在于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汉书》卷96下)昆莫年老,国分为三,不能专制。说到底,还是因为汉、匈在西域的力量对比悬殊。不过,乌孙仍然向汉朝“献马数十匹报谢”,并派使节随骞抵汉。西域使者首次来到中原,见中原如此富庶,颇为震撼,“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汉朝在乌孙眼中的这种转变对周边小国也

[收稿日期] 2005-09-05

[作者简介] 石少颖(1981-),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3级博士生。

影响日深,也促使了汉朝决定与西域小国加强往来的设想。张骞出使乌孙,进一步获得了域外信息,随行副使还被分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此后,一些国家的使节相继回访长安,汉天子均给予盛情款待,“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他们“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无不“倾骇之”。(《汉书》卷61)张骞“凿空”,开启了西汉与乌孙等国友好往来的序幕,为西汉王朝最终控制西域开辟了新的通道。

二、乌孙从“观望”到“归汉”的转变

乌孙是匈奴重大利益之所在,西汉打通乌孙,势必激起匈奴的强烈反对。在匈奴的军事威胁下,乌孙主动向西汉寻求庇护,表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汉室则要求“必先内聘,然后遣女。”乌孙立即遣使往聘。元封三年(前108),汉“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昆莫遂“以(细君)为右夫人。”与匈奴所遣妻昆莫的左夫人相对。尽管乌孙以左为尊,但汉家公主的介入,使匈奴在乌孙的独尊地位开始动摇。汉乌联姻使乌孙对匈奴的从属关系在本质上产生了松动,逐渐形成了对汉、匈“两属”的微妙关系。

乌孙“持两端”的根本原因是匈奴的压力,故私下里仍与之联系不绝。只要西汉的优势没有最终形成,乌孙就不会完全倒向西汉,甚至还会阻挠西汉在西域的经营。《汉书》载,李广利征大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渐轻汉……乌孙、轮台易苦汉使,为外国笑。”乌孙的观望态度使匈奴十分恼怒;而西汉的大臣们对乌孙的归附诚意亦有争议。大鸿胪萧望之就曾斥乌孙“持两端”、“难结约”。(《汉书》卷96下)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乌孙与西汉的实际关系。通过联姻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进程。^{[6] 19}

江都公主细君死后,应乌孙求,太初四年(前101),汉朝“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陁。”宣帝本始三年(前71),匈奴再犯乌孙,乌孙表示:“愿发国半精兵”,全力与汉共击匈奴。宣帝遂发兵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又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翁归靡)自将翁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乌孙皆自取所虏获。”(《汉书》卷96下)此次汉、乌合兵制胜,打破了自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李陵进攻匈奴失利后,汉匈一直处于相持阶段的僵局,改善了西汉的外交环境,震慑了西域诸国,在汉、乌关系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乌孙归汉的进程与汉朝对抗匈奴的战事遥相呼应,使匈奴陷入了两面夹击之境。“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汉书》卷94上)匈奴的衰弱使西域诸国叛逆情绪滋生,各国对抗匈奴大有同仇敌忾之势。基于此,汉朝于地节元年(前69)着手武威郡的设置,逐步巩固在河西路北侧的防御力量^{[7] 240}。

元康二年(前64),乌孙又主动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明确表明要与匈奴断交的立场。虽然,萧望之以为,“万里结婚,非长策也”,但宣帝还是以乌孙“新立大功”而允诺联姻。后来,汉朝终以“元贵靡不立”为由,征还少主,于情理上亦“信无负于夷狄”。(《汉书》卷96下)事实上,随着西汉在西域势力的巩固,其与乌孙的关系亦发生了微妙变化,联姻在西汉君臣看来已微不足道。大小昆弥分立之后,“汉遂不复与结婚”。甘露三年(前51),解忧公主上书乞归,“天子闵而迎之……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解忧公主在乌孙50年,从其国俗,先后嫁与3位乌孙昆莫。她50年之后还中原,乌孙却无力阻拦,充分说明乌孙对汉朝的从属关系已完全确立。

乌孙归汉是西汉历史上真正成功的联姻外交。当然,和亲只是一种温和的手段,汉、乌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仍在于汉朝实力的增强。乌孙归汉,是匈奴早期对外战略遭受的最大挫折,大大加速了其实力的衰微。吕思勉先生曾说:“自乌孙尚中立不肯朝会,况于西至安息哉?”^{[8] 133}失去了乌孙这块“跳板”,匈奴的西进计划实难以推行。本始三年之后,匈奴逐渐显现出焦躁不安和恐惧的情绪,常为一时之怒而大动干戈,但往往事与愿违。随着匈奴在西域势力的收缩,乌孙最终走进了西汉王朝的羁縻体系之中。

^[6] 《汉书》卷61《张骞传》。吕思勉先生讲,“其实初苦汉而后不然者,事久则习而安之”。一些汉使后来改善作风,收敛恶迹,西域小国态度遂平和下来,因此,西域小国态度的转变,“非必畏汉兵威也。”见于思勉《秦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3页。

西汉后期的和亲目的是借联姻羁縻乌孙。在赢得乌孙归附之后,联姻背后的不和谐已突显出来。据《汉书》载狂王为胡妇子,解忧与狂王,“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且与汉使谋刺狂王未成被困。后都护祁吉发诸国兵乃解围。此事是汉、匈西域之争的缩影。之后,汉朝斩杀谋刺狂王的汉使,又“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皆为表面现象。

三、西汉对乌孙的“分而治之”政策

解忧东返长安时,汉、匈争夺仍未平息。汉在乌孙扶植了亲汉的昆弥元贵靡;但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却“扬言母家匈奴兵来”,也自立为昆弥。汉于是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积居庐仓以讨之”;又派乌孙右大将妻、解忧侍者冯夫人游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惧,表示“愿得小号”。汉遂封元贵靡为大昆弥,而以乌就屠为小昆弥。大、小昆弥之分,是汉、匈争夺的侧面反映。

大、小昆弥虽因母系势力不同,但实为君臣之序,旨在维护西汉的权威。然而,西汉的干预往往与乌孙人的意愿相悖。小昆弥乌就屠不肯将诸翁侯民众全部归还大昆弥,西汉遂“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然众心皆附小昆弥。”西汉在乌孙插手经营、分而治之,尤其是对那些不友好的乌孙首领随意攻杀。使乌孙国内矛盾丛生,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汉书》载,“小昆弥末振将恐为(大昆弥)所并,使贵人乌日顿诈降刺杀雌栗靡(大昆弥)”,触动了汉在乌孙的权益。结果,在新立大昆弥翁侯难栖杀末振将之后,西汉竟“复使段会宗即斩其太子番吾”。西汉王朝这种无视乌孙的民族意愿与民族利益的非理智的报复行动,完全是一派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

由于大、小昆弥之间相互牵制,就难起叛汉之心,汉则可坐享渔翁之利。“分而治之”政策还弱化了大、小昆弥的独立意识,使其对汉朝的权威产生依赖性。只要迎合汉朝意志,昆弥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二者的矛盾也会因汉的调和而化解。久之,大、小昆弥放松了戒心,对外防御力量明显减弱。当末振将之弟卑援率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欲借兵兼并两昆弥时,两昆弥显得十分恐惧。至哀帝建平二年(前5),卑援已居强煌之地,拥十万之众,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汉朝担心单于与卑援相勾结,于是责让已为汉臣的匈奴将乌孙质子遣归;并派都护孙建将卑援袭杀之。

“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汉书》卷45)大、小昆弥分立,加强了西汉在乌孙的控制。但是“汉用忧劳,且无宁岁”。(《汉书》卷73)本想转嫁羁縻统治的风险,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模式往往会激起地区间新的矛盾,并使自己陷入被动的两难境地和无休止的征战之中。这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一种缺憾;类似的情况在历史长河中多次上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四、西汉对乌孙的羁縻管理

西汉在宣扬大国风范的同时,也体现了以德服人、“协和万邦”的外交理念和政治文化追求。“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册府元龟》)西汉对乌孙采取了一系列羁縻措施。汉朝对乌孙的控制,集中体现在“以夷治夷”。纳质是西汉“致疏俗”的象征。一般说,侍子归国后多为王位继承者。故西汉对待子的培植颇为用心。“在整个这个时期,汉朝始终坚定不移地寻求机会,支持质子们在其本土得到政权”,^[4] 419 乌孙遣子入侍,还为西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开渠道。文化的吸引力从深层的精神领域征服了乌孙。

西汉对乌孙的羁縻控制,还表现在“以夷攻夷”的政治谋略上。晁错曾言,“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朝用乌孙兵攻匈奴,可以优势互补,各取其长;乌孙为汉出兵,因为权宜之计,也不排除邀功请赏的动机。与汉朝联合,亦可巩固其在西域的大国地位。“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后汉书》卷89)“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后汉书》卷41)西汉常借外部势力来扩大领土,满足获取贡物的欲望。地节元年(前69),常惠为讨罚龟兹杀害汉校尉赖丹之罪,奏伐龟兹,大将军霍光让他“便宜行事”。常惠乃与“五百人俱至乌孙,还过,发西国兵二万人,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龟兹”。(《汉书》卷70)“以夷攻夷”的战略充分利用了西域国家间的矛盾,维持了各种力量间的平衡,从而使西汉的羁縻体系更加稳固。

贡赐贸易是羁縻体系在经济关系上的体现,是反映君主与臣属、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政治关系的特殊形式。贾谊说:“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汉书》卷48)乌孙每年要朝贡天子,汉朝也会赏赐赂遗来酬答他们。赂遗是西汉王朝对外施恩的重要手段。汉武帝时,曾经提出“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汉书》卷61)乌孙通过朝贡谋求政治上的依托和贸易中的利益,而汉朝也借以“重致远人”,以示天子之德。这种策略正是西汉经营西域能够不断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

在外交礼节上,四夷稽首称藩,汉天子则待之以礼;这样既确定了两者的宗属关系,又让四夷有种地

有的学者对解忧返汉提出新议,认为解忧返汉与汉朝当时与匈奴争夺中尚未获得全胜,仍有一定关系。而且“元贵靡、鸱靡皆病死”,有可能是死于非故,反映出当时汉、匈争夺非常激烈。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参见王庆宪:《匈奴争夺中活跃在西域的三位汉家公主》,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3期,第64-69页。

位上的优越感。元寿二年(前1)正月,乌孙大昆弥与匈奴单于俱来朝见汉帝,汉廷待昆弥礼同单于,使单于大为不悦。对于属国,西汉极尽保护义务;西汉若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汉书》卷49)此外,对乌孙君民来说,能够得到汉朝的印绶也是莫大荣耀,以至于发生乌孙人“盗(常)惠印绶节”(《汉书》卷70)之事;段会宗为惩罚大禄等人杀雌栗靡之罪,亦夺其“金印紫绶”,代以铜墨,以示惩罚和侮辱。

随着西域都护的设立及驻外使节的派遣,西汉对乌孙的羁縻管理进一步完善。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汉书》卷96)“总领百蛮,怀柔殊俗”;(《汉书》卷70)在西域有相当广泛权力。自首任都护郑吉以降,几乎每位都护都卷入了乌孙事务。而其他各类官员也以不同身份出使乌孙。他们或持节引领乌孙兵,夹击匈奴;或奉汉之命颁发印绶、赏赐赂遗;或插手乌孙内政,充当调停人;有时还要随机应变,斩杀敌手。史载,都护段会宗有“柔远之令德”,“西域敬其威信”,会宗病死乌孙,“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焉”。(《汉书》卷70)西域都护等官员在乌孙的经营,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汉朝尊严,是羁縻柔远思想之成功践履。

为巩固边防,西汉政府还在乌孙境内屯田,许多人因此常驻西域。《汉书》载,昆弥分立后,长罗侯常惠便“将三校屯赤谷”。晁错曾言,徙民安边,寓兵于民,可“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汉书》卷49)屯田对羁縻朝贡体制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后汉书》卷69)屯田利于疏通往来,为戍边将士及边郡提供了充实的物质支持,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汉书》卷49)屯田事业的兴衰成为汉朝对西域控制力及对西域经营之努力程度的重要见证。

乌孙问题的合理处置是羁縻政策在西域得以畅通的重要一环。由于两者不平等的外交地位,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小昆弥乌犁靡曾勒兵数千骑围攻段会宗,会宗便以“宛王郅支头县槁街”(《汉书》卷70)恐吓乌孙。虽然乌孙人的反抗时有发生,但汉朝凭借强大的实力牢牢地把握着羁縻体系的主动权。“仁育群生,义征不諲,诸夏乐贡,百蛮执贽”(《汉书》卷57下),西汉统治者希望周边国家感受到中原王朝的大国情怀,国家间的摩擦不足以改变西汉与各国间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

五、从乌孙归汉看西汉外交

西汉王朝与乌孙关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华夏文明辐射四方,吸引着四夷世代景仰和膜拜。《汉书》云:“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汉书》卷57下)西汉统治者以“天子”自居,致力于树立天下共主形象,“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汉书》卷49)希望用优越的礼治文化泽被四方,达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的境界。

自秦汉以来,“华夷一统”的礼治文化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存在于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而且成为中原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原则。打通乌孙、经营西域,与征朝鲜、平两越一样,都是汉朝实现“大一统”政治理想的重要步骤。一方面,汉天子胸怀天下,表现出对域外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圣帝流德,天下震慑”。(《汉书》卷65)但另一方面,在古代“五服论”地理观念的影响下,汉代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认为“夷狄荒服,荒忽亡常”,(《汉书》卷78)他们“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为益,弃之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并“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4] 410}。这两种思维取向,反映出西汉王朝自视文化优越,对周边民族久存文化排斥和民族偏见。汉朝既讲“怀柔远人”,又强调“华夷之辨”;这种观念给后来中原王朝吸取外来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受传统外交理念的影响,西汉王朝积极构建着以大汉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汉书》卷78)“羁縻远人”是儒家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中的运用,它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推广到国家关系中来,维护了汉王朝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西汉王朝恩威并施,充分发挥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优势,对乌孙采取军事威慑、分而治之、怀柔羁縻的策略,其目的就是使汉天子威德得以彰显,最终达到“汉德隆盛,远人宾服”。(《汉书》卷70)羁縻体制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体制,一种战略,更是历代中原统治者不懈奋斗、引以为豪的政治理想。

中原自古边患未息,尤以北疆为甚。汉之匈奴、魏晋之柔然、隋唐之突厥、明之蒙古,均曾是困扰中原王朝的强悍势力。因此,广结西域、北御蛮夷,一直是古代中国边防及外交的传统主题。为了防御北狄,中原统治者远交近攻,离强而合弱,与西域保持了密切联系,并把征服西域作为建立边功的最好体现。“汉武

“五服”是古人以中原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五个同心、分层次的地带,即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荒服。《汉书》载,周武王放逐戎夷于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

劳神,图远甚勤。王师驩驩,致诛大宛。娉娉公主,乃女乌孙”。(《汉书》卷 100 下)虽然西汉王朝远未达到唐朝那样登峰造极的程度,然而汉天子不遗余力、孜孜以求,满朝文武亦献计献策,颇为尽力。古代交通条件并不发达,人们眼界也不开阔,但汉朝积极拓展对外关系,保持了一种高昂进取、持之以恒的外交姿态。

外交是国家实力的较量,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延伸。有实力才会有对外关系中的主导权。汉朝在对外关系中优势的形成与西域各族对西汉的认同一样,是一个渐进过程。自王莽执政到东汉初年,国家未安,与西域联系也一度断绝。西汉之强盛与东汉之式微在两朝经营西域的事业中,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乌孙归汉还对当时中亚地区国家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昔人常言,大宛之役是西汉在西域争霸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书》卷 94 上)然而大宛之战固然使汉朝的军事威望大大提高,但毕竟以李广利投降匈奴而草草收场。连年征讨匈奴使西汉王朝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其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匈奴及广阔西域。相比之下,乌孙内附却是一个和平渐进的过程,极大地带动了西域诸国的归附热情,大大增加了西汉对外交往的信心,远比维持由战争得来的胜利局面更加稳固。

在二百余年间,西汉与周边民族之间演绎出了一幕纵横捭阖的历史剧。围绕着汉、匈对抗这个主战场,西域诸国纷纷卷入;而乌孙归汉与各种民族战争相交织,体现了西汉、匈奴与乌孙三者之间微妙的外交关系。乌孙从援汉作战中分得了物质利益和政治权益,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是小国外交的一种悲哀;西汉王朝假手乌孙控制了西域商道以及更广阔的地区,跳出了单纯对抗匈奴的范围,使“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对外经营目标最终实现。“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10] 117}随着乌孙归汉、西域内附,中外使节络绎于途,民族联系日益加深;丝绸之路广开,文化交流历久弥新。汉韵享誉塞外,胡风亦频入中原,两者相得益彰,成为中外友好往来之历史见证。

[参 考 文 献]

- [1] 洪涛.关于乌孙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4,(2).
- [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3] 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4).
- [4] 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5] 张维华.汉史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0.
- [6]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7] 王宗维.汉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 [8] 吕思勉.秦汉史(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罗 焱]

A Survey of the Diplomacy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Kingdom Wusun 's Submission

SHI Shao-y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Wusun us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Huns. The foreign policy "To cut off Huns' right arm" was firstly based on Wusun and then expanded as a grand blueprint for the whole Western Region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barbarian idea", Han's dominator adopted diplomatic marriage and military deterrence, which changed Wusun's standpoint from "hesitation" to "submission". Wusun's submission to Han dynasty was the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after the battle with Dawan Kingdom,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to the anci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in Central Asia.

Key words: Western Han dynasty; Western Regions; Wusun;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barbarian idea"

张维华指出,汉征大宛与方术思想有很大关系。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遂名曰“天马”,更名乌孙马曰“西极”。汉武帝劳师远征大宛,“抱必克之信念”,表面为立威西域,实有求作神仙之想。换言之,即为方士之说所激动也。参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第345~355页。